

# 康熙皇帝與天主教

林雪碧

## 傳略

康熙帝本名愛新覺羅玄燁，生於順治十一年（1654），八歲為帝，改元康熙，世人慣以其年號稱之。康熙六十一年（1722），卒於北京暢春園，享年六十九，廟號聖祖，是中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。

康熙帝為清世祖順治帝第三子，並不特別受父親的喜愛，他能夠繼承皇位，可說是頗具戲劇性。當玄燁的四弟出生時，順治帝隆重地祭告天地及太廟，並稱之為「朕第一子」，冊封為「榮親王」，明顯是要以這「第一子」為繼承人，只是榮親王於三個月後夭折，順治帝也就不再考慮皇嗣的問題。其後，順治帝染上天花，在母親孝莊皇后的敦促下，順治帝從新考慮繼承人選，他本要立一位堂兄弟繼位；但是，被順治帝尊崇如師如父的傳教士湯若望（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, S.J., 1591-1666）進言，認為眾皇子之中，只有玄燁出過天花，不會再受此病的威脅，可以活得長久；就此一言而定，玄燁被立為嗣<sup>1</sup>；未幾年僅廿四的順治帝駕崩，玄燁繼位，由鰲拜等四人輔政。康熙帝是歷朝皇帝中與天主教會接觸最頻繁的一個，而湯若望其後被人誣害，也是靠康熙帝而得平反，這恐怕是湯若望舉薦他時所想不到的。

---

<sup>1</sup> 魏特著，「湯若望在清宮」。見《康熙帝傳》，珠海：珠海出版社，1996。287頁。

康熙帝繼位之後，面對內憂外患。首先他要剪除鰲拜，廢除輔臣，奪回執政大權。然後，相繼撤除明朝降將吳三桂等三藩的勢力，收服台灣鄭氏政權，抗擊俄國的入侵保衛東北疆土，並平定噶爾丹叛亂統一蒙古各部。

康熙帝非常重視知識份子，尊崇朱熹理學，曾多次開辦博學鴻儒科，又御製《康熙字典》、《歷象考成》、《皇輿全覽》等。他在拜謁山東曲阜孔子廟時，行三跪九叩大禮，此舉或有造作之嫌，但是當明朝皇帝對孔子也只好行二跪六叩之禮時，這個異族皇帝怎不令漢族儒生折服！

在民政方面，康熙帝親自巡視黃河河道督察河工；他下令王公大臣停止圈地，整頓稅制，放開墾荒土的免稅年期，減輕百姓的負擔。

康熙帝以沖齡嗣位能成就大業，其祖母孝莊皇后得力甚多。康熙帝生母孝康皇后於康熙二年病逝，當時康熙帝還只得十歲，他雖貴為九五之尊，然失去母愛，亦使他「哭無停聲」<sup>2</sup>。孝莊皇后便親自擔起了教誨孫子小皇帝的重任，她雖然鍾愛康熙帝，但並不胡亂遷就他，反而對他要求極嚴；康熙帝自言：「朕自幼齡學步能言時，即奉聖祖母慈訓，凡飲食、動履、言語，皆有矩度。雖平居獨處，亦教以罔敢越軌，少不然即加督過，賴是以克有成。」<sup>3</sup>康熙帝與父母相處時日雖短，但卻有極深之感情；他對祖母更是無微不至，即使在親政後日理萬機，他仍常常親自為祖母打點，對祖母之意不稍有違。

---

2 《清聖祖實錄》，卷 8，10 頁。

3 《清聖祖御制文二集》卷 40。轉引自孟昭信著，《康熙評傳》，南京：南京大學，1998。41 頁。

當然，康熙帝並非完人，他也有缺點。譬如他過於寬仁，對有過失的官員往往從輕處置，以致吏治敗壞，貪污處處。他後來亦趨向保守，竟說西學中源，即西方的學問皆源於中國。他又以戴名世所著的「孑遺錄」記述明末三王的事，興起文字獄，株連二百多人。但是，總的而言，無論文治或武功，康熙帝都稱得上是中國歷史上一等一的好皇帝；而在孝順一行，亦是歷朝帝皇中所僅見。

## 西學與傳教士

康熙帝幼承祖訓，雄才大略，以經世治國為任，因此對於一切有利於國計民生的，他都願意嘗試，西方科技就是其中之一，這也是他獨步於芸芸帝皇之因。康熙帝接觸西方科技是以平反湯若望一案為契機。

康熙三年（1658），楊光先狀告欽天監湯若望假修曆之名，陰行邪教；並嚴責湯若望為榮親王選擇下葬之期失當，致使順治帝早逝等等罪名。湯若望被判凌遲處死，楊光先則竊取欽天監之職；當判處湯若望的公文送到孝莊皇后手中不久，北京發生大地震，孝莊即乘機以此為上天對冤獄的示警，力主釋放湯若望。結果，湯若望雖得暫緩死刑，但輔政大臣仍堅持囚禁他在獄中；與教會親近的御史許之漸等皆被免職，多名西方傳教士被押送廣州發辦，是為有清一代第一次教難。

其實湯若望不但為順治帝的重臣，孝莊與他亦有交情，私下更尊稱他為「義父」<sup>4</sup>。孝莊不能直接否定輔政大臣的議決，她只有經常向

4 同註1，249頁。

康熙帝述說湯若望的好處，要康熙帝一有機會便開釋湯若望。直至康熙帝親政，當時湯若望已因年老離世多時，康熙帝還是宣召南懷仁 (Ferdinand Verbiest, S.J., 1623-1688) 上朝，要他代替湯若望與楊光先比賽推算正午日影。經過一連三天的驗證，南懷仁均正確地推測得日影所在，楊光先則每無法測到。康熙帝又命南懷仁檢驗楊光先所制曆法，結果發現楊光先的曆法錯謬甚多。康熙帝八年，康熙帝指示南懷仁等上書為湯若望平反，並派人重審湯案，發現楊光先加於湯若望的罪名全都不成立；於是，康熙帝革除楊光先，恢復湯若望名聲，將從前佔用了的教堂和墓地一一歸還。

是時，康熙帝雖仍是少年，但是他也明白到天文曆法並非只限於訂定吉凶日之用，對於以農立國的中國而言，精確的曆法實在非常重要，於是，他頒令全國採用南懷仁所訂曆法，任命南懷仁為欽天監監副，後又升為監正，是為繼湯若望後入主欽天監之西洋人，此後百餘年雖幾度禁教，但仍以西洋教士任職欽天監。南懷仁精於天文曆法，也十分擅長製造天文儀器，今日北京古觀象台所保存的幾件天文儀器，如天體儀、黃道經緯儀等就是南懷仁所造的。可惜的是，康熙帝雖為湯若望平反，但礙於朝中大臣的議論，他仍下旨禁止傳教士傳播天主教：「……其天主教，除南懷仁等照常自行外，恐直隸各省或復立堂入教，乃著嚴行曉諭禁止。」

康熙十二年 (1673)，三藩叛亂，初期朝廷處於下風，康熙帝便要求南懷仁製造大炮作打仗之用。南懷仁不願從命而推辭，至後來推無可推才答應了。南懷仁鑄造了大量的火炮，「於每炮製成後，必在製造局內，設台供天主像，自穿司鐸品服，虔誠跪禱，行祝炮禮，每炮賜以教中聖人名號，令鑿刻其上。」這些火炮被送到陣前，大收破敵

之用。南懷仁造炮之事受到其他修會人士非議，但教宗英諾森十一世卻致函南懷仁予以支持：「你的信中最令我高興的是如何明智地、適當地應用世俗科學來拯救中國人民，和用它來提高基督教的信仰。」<sup>5</sup>

康熙帝親身體驗到西方科技之能，對西學起了親近之心；他的興趣是多方面的，例如，他在宮中建立一個實驗室，命傳教士製造各式各樣的藥丸藥散，然後將製成的藥物分送給皇子、大臣和侍從，自己出遊時也會隨身攜帶，以備不時之需。

康熙帝在應用西方科技方面，成就最突出的要算是用科學方法繪製全國地圖；利瑪竇雖曾繪製了一幅「萬國輿圖」，但錯謬極多，於是康熙帝經過充份的準備，在康熙四十七年(1708)，委派了白晉(Joachim Bouvet, S.J., 1656-1730)、杜德美(Pierre Jartoux, S.J., 1668-1720)等傳教士聯同中國學者何國棟等人，在全國展開大規模實地測量，以繪製一幅精確詳細的中國地圖，各省官員都奉命對這項工作給予大力支持；十一年後，終製成「皇輿全覽圖」。此圖於山川水脈、村寨雕堡等無一遺漏，李約瑟評之為：「不但是亞洲當時所有的地圖中最好的一幅，而且比當時的所有歐洲地圖都更好、更精確。」<sup>6</sup> 教士們則在各省各地勘察之餘趁機傳教。

傳教士也參與清廷的外交事務，而最重要的一次是張誠(Jean Franco Gerbillon, S.J., 1654-1707)和徐日昇(Thomas Pereira, S.J., 1645-1708)為中俄就疆界談判時擔任使團翻譯。那時，俄國經常侵擾

5 顧衛民著，《中國天主教編年史》。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3。189頁。

6 李約瑟著，《中國科學技術史》。北京：科學出版社，1976。卷5，分冊1，235頁。

中國東北，清廷遣大軍驅逐俄國人；清廷雖在戰事上佔優，但清軍一去，俄人又至，如此一去一來，兵戰連年但仍無法確保邊境安全。於是，康熙帝接納俄國要求和談的建議，派出議政大臣索額圖和國舅佟圖綱為談判的全權代表。但是，中國官員都沒有國際法的觀念，於是康熙帝又選派了張誠和徐日昇作為談判使團的成員，授予三品頂戴；一則是希望他們以國際法的原則和辦法為中國爭取最大的利益，二則是要他們擔任翻譯。經過幾番周旋，中俄雙方終於在康熙廿八年（1689）簽訂了《尼布楚條約》，這是中國第一次與外國簽訂的平等條約。條約以拉丁文寫成，康熙帝並命人在邊界立碑，碑上刻有滿、漢、蒙、俄及拉丁五體文寫成的條約內容，為此次和平解決兩國糾紛作見證。通過這條約，中國的利益得到了保障，直到咸豐八年（1858），俄國人才藉著《璦琿條約》吞併了黑龍江以北的廣大土地。索額圖對於張、徐二教士的表現，感到非常滿意，多次感謝他們使他這個全權代表能完成談判使命，並表示日後如有什麼困難都可以找他幫忙；張誠便抓住機會向他說：「……我們的一切願望最終就是讓人們認識真正的上帝，讓人們遵守上帝神聖的法律；但是使我們難過的是，以前的幾道詔書禁止中國人投入上帝的懷抱。既然您對我們如此之好，我們懇求您某天見到皇上時，請皇上取消禁令。這比您給我們財富和榮譽還要好。」<sup>7</sup>幾年後，索額圖果然履行了他的諾言，為教會爭取自由傳教而盡過力。這裡順帶一提，張、徐二人被中國人視為表現良好，在俄國人心目中他們便成為大壞蛋了，就在和約簽訂後，俄

---

7 「耶穌會傳教士洪若翰神父致國王懺悔師、本會可敬的拉雪茲神父的信」寫於 1703 年浙江舟山。見《耶穌會士中國書簡集》，第一卷。河南：大象出版社，2001，279 頁。

國使團返回莫斯科之時，俄國政府就把張、徐的同會弟兄都逐出了俄國。

康熙帝不但使用傳教士呈上的製成品，他更要親自學習。康熙帝先是跟從南懷仁學藝，南懷仁死後，就跟張誠、白晉等人繼續學習。傳教士把歐基里德幾何學等譯成中文，作為皇帝的教本；而康熙帝的學習能力也很驚人，他要早晚各上課兩小時；傳教士們離開後，他就獨個兒複習剛學到的新知識，即使在出外狩獵期間也不間斷。康熙帝會拿著各種測量儀器，跑到野外測量山的高度和河的濶度；他也會把這些學問親自教授給他的王子們。康熙帝也曾學習過拉丁文，還提出翰林院應學習外國文字<sup>8</sup>，這也是極有遠見的。

康熙帝如此熱中於西學，感到西洋傳教士人數太少，於是就命白晉到法國招募更多人材到中國來。白晉亦不負所託，康熙卅八年再度來華時，帶同了巴多明 (P. Dominique Parrenin, S.J., 1663-1741) 等十名教士。

有人譏諷傳教士攀附權貴不務傳教正業，但正如上文引述教宗英諾森十一世的信件，傳教士的策略是藉著中國文士所不懂的知識和服務，為傳教事業在道路閉塞的地方闢出可行之路。事實上，康熙八年的禁教令仍然有效，如果傳教士不為朝廷服務，不能得到皇帝的信任，可能連逗留在中國境內也有困難。傳教士多次在私人函件中表達

---

8 《清聖祖實錄》，卷 223。轉引自余三樂著，《早期西方傳教士與北京》。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1，189 頁。

了希望以俗世的服務換取傳教的活動：「來回奔波與熬夜使他們（傳教士）極度疲憊，有時候使他們難以忍受；但是要使皇帝感到滿意，使皇帝能對我們神聖的宗教好一些的願望支撐著他們，減輕了他們的痛苦。」<sup>9</sup> 於是儘管辛苦難熬，又或被人誤解，他們仍然一個接一個的來到中國，為朝廷效力。

## 教務發展

康熙帝對傳教士可謂禮遇有加，他通常會給予在朝供職的教士以二、三品的官職。另外，為了方便聽課，康熙帝會讓為他授課的傳教士登上他的坐台，出巡狩獵時也要教士們陪伴在側。遇有傳教士逝世，康熙帝常會賜銀若干修築墳墓，派侍從出席喪禮，並會下旨褒揚。至於賞賜御膳，更是常有的事。這是皇帝對其他大臣少有的「恩寵」，朝臣有目共睹，致令他們縱然對天主教懷有敵意，但表面上仍得客客氣氣。不過，京城以外，山高皇帝遠，仇視教會的事例仍然經常發生。在眾多傳教士中，康熙帝最信任南懷仁；南懷仁運用自己的影響力，經常保薦傳教士到朝廷工作，又或讓他們到各地傳教<sup>10</sup>。所以雖在禁教期間，傳教士們仍可以有限度地傳播福音。

康熙卅年（1691），浙江巡撫張鵬翮，飭令所轄地區百姓不得傳習天主教，而城內暴民就趁機搶劫基督徒：「人們對我的可憐的基督徒施行的暴力；人們搶劫他們的錢財，進入他們的住宅，虐待他們，扔

---

9 同註 7，280 頁。

10 康熙廿六年上諭，傳教士要持有南懷仁的印鑒，可以自由通行全國傳教。

掉他們的聖像，使他們整日不得安寧。<sup>11</sup>」在北京供職的傳教士知悉後，即面奏康熙帝給予解禁。康熙帝下旨禮部商討此事，當時禮部官員以康熙八年的禁教令仍然有效為由，支持張鵬翮的措施。康熙帝本就有意解除禁教令，加上索額圖從中斡旋，禮部官員唯有改變立場，終於在康熙卅一年草擬了解除禁教令的奏文：「查得西洋人仰慕聖化，由萬里航海而來，現今治理曆法，用兵之際造軍器火炮，差往阿羅素（俄羅斯）誠心效力，克成其事，勞績甚多。各省居住西洋人並無為惡亂行之處，又並非左道惑眾，異端生事。喇嘛僧道等寺廟尚容人燒香行走，西洋人並無違法之事，反行禁止，似屬不宜。相應將各處天主堂俱照舊存留，凡進香供奉之人仍許照常行走，不必禁止。使命下之日，通行直隸各省可也。」康熙帝批示：「依議」。這是鴉片戰爭前，天主教在中國傳教之唯一官方正式認可之文件。

翌年，康熙帝染上瘧疾，一眾御醫束手無策，白晉、張誠進呈了藥粉，洪若翰（P. Jean de Fontaney, S.J., 1643-1710）和劉應（Claude de Visdelou, S.J., 1656-1737）等又呈上由法國運來的金雞納霜（奎寧丸），治癒了康熙帝。康熙帝遂把蠶池口之賞賜給張誠建造房舍，兩年後，再賜府第旁之地，興建聖堂。

聖堂在康熙四十二年（1703）建成，正面刻有「敕建天主堂」幾個金色大字，名命為「救世主堂」。救世主堂位處京城之北，與宣武門「無玷始胎聖母堂」南北遙遙相望，習稱北堂<sup>12</sup>。北堂建造非常宏

11 同註 7，281 頁。

12 北堂於道光七年（1827）被沒收，道光十八年被拆除。現時的北堂為光緒十四年（1888）於西什庫重建的。

偉，教堂主樓長七十五尺，寬三十三尺，高三十尺。內部分為兩層，每層有十六對柱子；下層的雕像的底座用大理石製造的，上層的雕像的底座都是鍍金的；教堂頂畫滿了畫。無論官宦士紳或平民百姓都被吸引到堂內參觀。傳教士為聖堂的落成舉行了隆重的感恩祭：「教堂直到 1703 年 12 月初才開放。我們選了一個星期日舉行揭幕儀式。耶穌會在這個耶穌會駐東方的巡察使閔明我 (Philippe-Marie Grimaldi, S.J., 1639-1712) 神父和其他不同國籍的傳教士莊嚴地為新教堂作了祈禱。十二個穿白色祭衣的教助員拿著十字架、蠟燭和香爐等等。兩位佩著襟帶，穿著白色祭衣的神父走在聖像兩旁，其他傳教士兩人一排跟在後面，然後是虔誠的基督教徒們的隊伍。禱告結束，大家都在祭台前跪下，神父們排在內殿，所有的教徒都排在中殿，他們都好幾次用額頭碰地。彌撒由張誠神父和執事及副執事一起主持，我們可以把張誠神父看作是這個新教堂的創始人。有一大批教徒在新教堂領聖體，我們為我們的國王作禱告，閔明我神父作了一感人肺腑的講道。最後，以一大批新教徒受洗來結束這次重大慶典。<sup>13</sup>」

經過不斷的努力，教務在康熙朝有著顯著的發展，而北堂之建成，可說是標誌著教會傳入中國以來的一個黃金期。據資料所得，從康熙初年楊光先教難到康熙四十年，在華傳教士由不足四十人增加至一百四十四人，另外還有九名中國籍教士，而第一位國籍主教羅文藻也是在此期間被祝聖為主教的。在朝供職的多為耶穌會士，而在外省傳教的，除耶穌會士外，尚有道明會士、方濟各會士等<sup>14</sup>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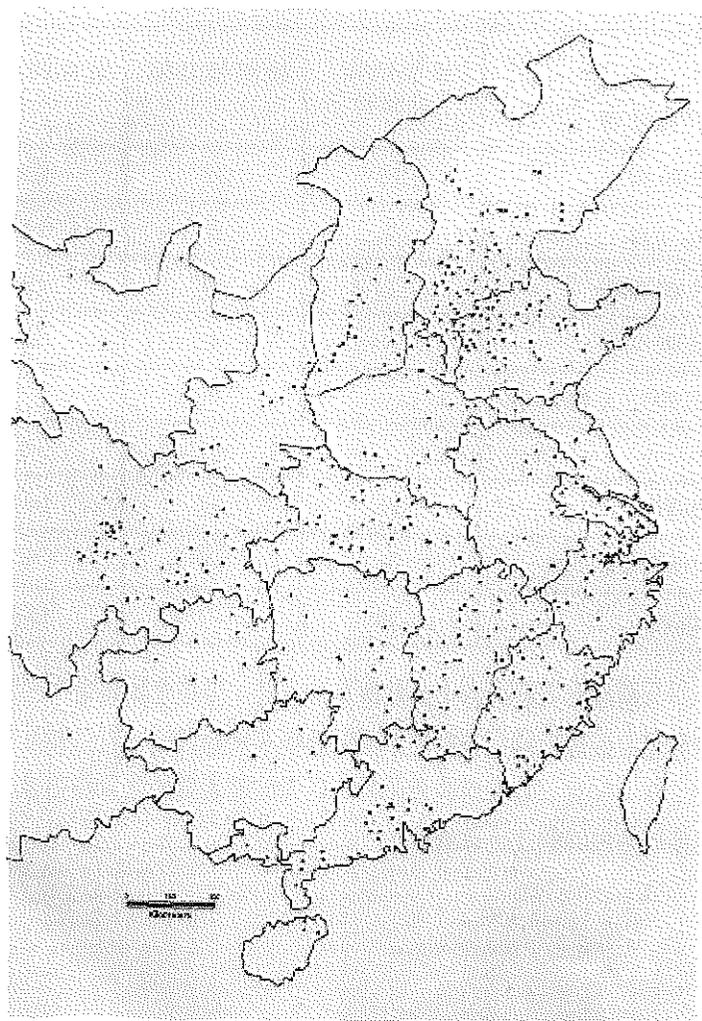
13 「耶穌會中國教區的傳教士杜德美神父給巴黎封特奈神父的信」寫於 1704 年 8 月 20 日北京。見《洋教士看中國朝廷》。上海：人民出版社，1995，51-52 頁。

14 *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*, N. Standaert ed. Leiden: Brill, 2001.307.

年份 所屬修會	康熙四年 (1665)	康熙廿九年	康熙四十年
耶穌會	26	33	82
道明會	9	6	12
方濟各會	1	15	29
奧斯定會		4	6
巴黎外方傳教會		9	
?			15
小計	36	67	144
中國教士	2	10	9
總計	38	77	153

全國教友人數則由十萬餘增至二十萬，分佈全國各地<sup>15</sup>。在北京的傳教士雖得康熙帝的寵信，但由於要在朝廷供職，難以顧及民間傳教工作；因此，若單以數量而言，外省的發展要比北京快得多，其中以江南地區的教友人數最多。

15 另一說法為三十萬，係根據李明 (Louis Le Comte, S.J., 1655-1728) 於 1697 年的教務報告，但李明於報告中亦已說明他並不知道真確的數字。很多教士把歷年受洗的教友數目，與現有的教友數目混淆，現據可靠資料再行統計。同上，383 頁。



康熙四十年 天主教友分佈

面對遼闊的土地及增長迅速的教友，傳教士人數之少實在不敷應用，而且西方傳教士也不是經常可以在坊間隨意走動。所以由明朝以來，傳教士都有組織起教友來。教友組織很多樣化，有為小孩而設，有的為知識份子；有的從事慈善服務，有的負責出版。不論何種形式，最重要的是讓教友在缺少神職人員時，仍然聚會祈禱，互相勉勵。「耶穌基督和聖母瑪利亞的各種團體對宗教的這一切發展功不可沒。我們每個月都要舉行聚會，有時還要經常聚會。在舉行了通常的宗教儀式後，我們選出五六個最熱忱最能幹的會員去對基督教徒進行家訪，了解是不是全家都已入教，每天早晚是不是祈禱，是不是去做彌撒，是不是幫助病人，有沒有設聖水，最後，有沒有通過言論和神聖的榜樣力量去爭取非基督教徒。<sup>16</sup>」

組織教友之外，傳教士也忙於寫作。當時傳教士有關宗教信理的著作過百種，茲列舉一二如下：

南懷仁著《教要序論》、《告解原義》、《道學家傳》（記載離鄉背井到中國來傳教的神父名冊）

白日陞（Jean Basset, MEP, 1662-170）著《經典記略問答》（解釋聖經之作）

利類思（Lodovico Brglio, S.J., 1606-1682）著《聖事禮典》，《司鐸日課》等，又與安文思（Gabriel Magalhaes, S.J., 1609-1677）合譯《超性學要》（多瑪斯《神學大全》）

---

16 「關於中國傳教會現狀的匯報：1703年由耶穌會士魏方濟神父在羅馬呈尊敬的耶穌會總會長。」同註7，234頁。

傳教士希望藉著出版書籍，可以更清晰地闡釋教義，也讓福音流傳得更遠更廣。今天，這些著作，已經成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文化遺產。

## 康熙帝再次禁教

禁令雖然解除，但朝臣猜忌傳教士會與他們爭奪功名利祿，百姓對教義仍然有很多誤解，這些對傳教都造成很大的障礙；然而，最大的障礙不是朝臣、不是百姓，竟是來自教會內部、傳教士本身。正當康熙帝對傳教士愈益倚重之時，爆發了震撼整個傳教工作的禮儀之爭。

禮儀之爭肇始於利瑪竇在中國傳教時所採用的適應策略。利瑪竇認為天主教教義與儒學並不矛盾，有些地方可以互相補充，他允許教友參予傳統的敬天敬孔儀式，或為先人立牌位。此舉，有利於教會融入中國社會，但並不是每個人都認同的，即如利瑪竇的繼任人龍華民 (Nicolas Longobardi, S.J., 1559-1654) 也不贊同。

表面上，禮儀之爭只是對教義有不同詮釋及文化認同上的爭拗，但是，內裡卻涉及修會之間的不信任，牽涉同會但不同國籍的會士之間的不睦，也關係到法國與葡萄牙爭奪遠東保教權的利益衝突。其中緣由，已有多部專書討論，在此不贅，今只述康熙帝與此事的關係。

康熙卅二年 (1693)，也就是解除禁教令的第二年，福建代牧嚴璫 (Charles Maigrot, MEP, 1652-1730) 頒布訓令禁絕利瑪竇的適應政策，並秘密派人赴羅馬上書教宗。幾年後，消息傳回中國，耶穌會士深恐這會對中國的傳教事業造成嚴重的打擊，將來能否存在也成問

題。於是，請求康熙帝出面申明祭祖敬孔的真義。康熙帝也是想做些調解工作的，他發佈上諭說：「敬孔敬祖純為表示愛敬先人和先師，不是宗教迷信。<sup>17</sup>」耶穌會士把康熙帝的批示由四條不同的路線，分途趕緊寄往羅馬。然而，這些解釋並不起作用，康熙四十三年，教廷議決教友不能參予祭祖敬孔儀式，其決議案比嚴璫的訓令還要嚴厲。教廷以此決議與歐洲無關，沒有在歐洲公布，只派多羅(Carlo Tommaso Maillard de Tournon, 1668-1710) 為特使前赴中國執行禁令。

康熙四十四年(1705)多羅來華，康熙帝對此寄予很大希望。因多羅為第一位來華之宗座特使，又在途中染重病致不能起床，康熙帝對多羅極是憐憫。在第一次與多羅會面時，康熙帝態度和藹，禮節隆重，並隨即命人攜帶禮物，到羅馬獻予教宗作回禮。多羅希望任命一人統理中國教務，禮貌上請康熙帝給個意見，康熙帝認為總管的人選應是熟悉中國事務並為朝廷效力之人，理應是在朝供職的耶穌會士，但是多羅不信任耶穌會士，以致此事懸而未決。

康熙帝多次探問多羅來意，但多羅恐怕祭祖禁令惹起康熙帝反感，沒有告以實情，也不肯與康熙帝討論關於禮儀的問題，只推說此行係代教宗向皇帝問好。康熙帝當然不信，覺得多羅有意欺瞞，對他的態度便大不如前。當時，在華傳教士尚未知道教廷對禮儀問題已有定案，在京耶穌會士還勸多羅要聽取皇帝的意見；但是，多羅認為嚴璫才是真正的中國問題專家，於是將嚴璫給康熙帝引見。康熙帝一見嚴璫，發覺嚴璫只會福建方言，與自己對話尚需翻譯，莫說修習中國

---

17 羅光著，《教廷與中國使節史》。台中：光啓，1961，96-97頁。

經書，連御座後的四個字也只識其一。康熙帝大怒，認為他們不通中國情理卻妄論中國之事，猶如「立於大門之前，論人屋內之事，眾人何以服之？」<sup>18</sup>稍後，康熙帝下令境內傳教士，必須按「利瑪竇規矩」行事，並立誓此後不回西洋，方得領取在中國居留的「票」。同年，驅逐嚴璫出境；康熙帝對嚴璫極之不滿，即使事隔數年，每一提起均怒罵不已。

多羅則無論如何也要履行宗座特使的職責，他走到南京後，發出公函下達了教廷的禁令：「當他們（基督徒）問到敬孔子和祖宗的焦點的問題時，他們應該作如下回答：不行。我們不能奉這樣的祭品。我們不允許聽從神律的人們祭孔和祭祖。同樣地，關於中國人習慣使用牌位以尊敬死去的祖宗，回答是：不行。當他們被問到：『上帝』或者『天』是否是基督徒的真正的天主時，回答：不是……」<sup>19</sup>康熙帝會御筆題書「敬天」二字匾額送贈北京南堂，並特別聲明敬天即敬天主。多羅此一禁令，實在是對康熙帝的大不敬，看來，多羅若非宗座特使，又若非外國人，必會被治以欺君大罪。

多羅被逐往澳門，葡萄牙人不滿教廷未得葡王同意而遣使中國，侵害其保教權，於是將多羅拘禁起來，又明令澳門教士不得承認多羅的特使身份。可憐多羅，患病已久，出使又遇連翻挫敗，正是內外交困，於康熙四十九年（1710）病逝澳門，年只四十二。

---

18 康熙四十五年上諭。見《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》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七輯。台北：文海，1974，冊 69-70，10 頁。

19 多羅教令。見《羅馬教廷有關中國禮儀之爭文獻一百篇》。轉引自顧衛民著，《中國天主教編年史》，上海：上海書店，2003，230-231 頁。

南京公函與康熙帝的聖旨讓傳教士左右為難。由於公函是以多羅名義發佈，而非宗座諭令，在華傳教士對此意見分歧，願意按皇帝旨意領票留居的大多是耶穌會士，而遵照公函禁止教友敬祖敬孔的則相繼被逐出中國。部份傳教士又上書教宗，要求撤銷公函的制約，中國境內的教會顯得一片混亂。康熙帝也不相信南京公函是教廷對禮儀問題的定案，前後兩次派了四名傳教士到羅馬向教宗陳述中國祭禮的真正意義，可惜此四人中的三人均死於途中，而另一人在羅馬患病，未能覆命。康熙帝並不知道四人境況，還一心等著他們回奏教宗意向。就在此時，康熙五十四年（1715），教宗格萊孟十一世頒布《從登極之日》通諭（*Ex illa die*），重申禮儀禁令。消息傳至中國，所有傳教士均須服從；但是要教友不敬天敬孔，表示此生當官無望，而不祭祖，又犯不孝大罪，因此很多教友都脫離教會。朝中大臣乘著教會內亂，上奏禁止百姓信奉天主教，康熙帝則始終不信教廷會作出這樣的禁令，仍然堅持要等自己派去的人回來後，才作定論。

教廷為處理中國禮儀問題的善後事宜，於康熙五十八年（1719）再一次派遣特使到中國來，這次選派了嘉樂（Carlo Mezzabarba, 1685-1741）。有鑒於多羅的遭遇，嘉樂處事非常謹慎。至於康熙帝，只信任耶穌會士，而嘉樂使團中全是「不通中國文理」之人，竟無一耶穌會士，康熙帝覺得教廷有所偏私；況且，他所派赴羅馬的使者，始終未回，斷言他們都被「暗害殺死」<sup>20</sup>了。在未見嘉樂時，康熙帝已由臣下向對方傳旨：「朕之旨意前後無二，爾教王條約與中國道理大相悖謬，教王表章，朕亦不覽，西洋人在中國行不得教，朕必嚴行禁止，

---

20「嘉樂來朝日記」。同註18，45-46頁。

本應命爾入京陛見，因道理不合，又生爭端，爾於此即回去，明日著在京眾西洋人於拱極城送爾。西洋人中有不會技藝之人，爾俱帶去；再爾等問嘉樂，帶來會技藝之九人，伊等情願效力者，朕留用，不願在中國者，即同回去，朕不強留。<sup>21</sup>」康熙帝拒絕接見嘉樂，並恐嚇著要禁止傳教事業及驅逐傳教士，這大概是要給嘉樂一個下馬威。果然，嘉樂見事態嚴重，唯有苦求康熙帝，自言自己身為特使，不能更改教宗諭令，只能將康熙帝的意見向教宗傳達，並在有限範圍內給予了八項豁免，讓教友可以參加不涉宗教性質的敬孔敬祖禮儀。康熙帝見此，略顯和緩，前後十三次接見嘉樂，每每重申天主教於中國無用，只是體念傳教士遠道而來才以禮相待；而中國古書義理無窮，外國人未識其中真諦不應隨意批評等等。於禮儀問題上，與嘉樂仍然各執一詞，毫無轉圜餘地。

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）十二月廿一日，嘉樂與一眾傳教士將教宗諭令譯成中文，稱為禁約，呈遞予康熙帝。康熙帝見禁約與嚴璫當年所呈者同一模樣，顯示自己多年來恩威並施，幾翻曉諭均屬無用，於是在禁約後加以硃批：「以後不必西洋人在中國行教，禁止可也，免得多事。<sup>22</sup>」曾一度生氣勃發的傳教事業，就此消沉，直至道光廿二年（1842），教會才在洋槍炮的伴隨下再叩開中國大門。

21 同上，74頁。

22 康熙五十九年上諭。同註 18，96頁。

覽此告示。只可說得西洋人等小人。如何  
言得中國之大理。況西洋人等。無一人同  
漢書者。說言議論。令人可笑者多。今  
見來臣告示。竟是和尚道士。異端小教  
相同。此等龍言者。莫過如此。以後不必  
西洋人在中國行教。禁止可也。免得多  
事

康熙五十九年 康熙帝禁止傳習天主教

## 結語

有論者認為康熙帝與教廷不能通使，是因「康熙帝之專權驕橫<sup>23</sup>；也有人認為康熙帝一直與傳教士相處得很好，而從他賜予各個教堂的匾額，特別是他所題的七律：「森森萬象眼輪中，須識由來是化工。體一何終而何始，位三非寂亦非空。地堂久為初人閉，天路新憑聖子通。除卻異端無忌憚，真儒若個不欽崇。」可見他對天主教教義有一定的理解，若非囿於帝王枷鎖及禮儀之爭，他必會受洗入教。

禮儀之爭直接導致康熙帝再行禁教，實在令人惋惜。但是，得到康熙帝賞識的宗教團體，不光只有天主教。他曾親臨佛教重鎮五台山各廟宇上香拜佛，御賜菩薩頂「五台聖境」橫匾；出巡各地時，經過名山古剎，每每御筆提字，以致「寫寺廟匾額，多至千餘<sup>24</sup>」。所以，儘管康熙帝從未對天主教教義加以惡評，他為傳教士離鄉背井，不為名利，甘願犧牲而受感動；但是，我們也無須把康熙帝對天主教會的善意無限放大。康熙帝對仙佛神靈之說，在不同的階段有過不同的看法。康熙十二年，康熙帝與熊賜履談到治世之道時，表露出對神仙佛道的憎厭：「朕生來不好仙佛，所以向來爾講闢異端，崇正學，朕一聞便信更無搖惑。對曰：帝王之道以堯、舜為極。孔孟之學，即堯、舜之道也。此外不特仙佛邪說在所必黜，即一切百家眾技，支曲篇雜之論，皆當擯斥勿錄，庶幾大中至正，萬世無弊……<sup>25</sup>」但是，康熙帝

---

23 徐宗澤著，《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》。影印本。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90，230頁。

24 《清鑑綱目·聖祖康熙》。台北：啓明，1959，卷5，309頁。

25 《康熙起居》，康熙十二年十月初二日。北京：中華，1984，冊1，124-125頁。

也明白到作為皇帝不能對某家某派輕言禁絕，而在他漫長的統治期間，他也漸漸體會到宗教之勸人向善，與儒家無異，對他治國安邦同樣有利：「人生於世，最要者唯行善。聖人經書所遺，如許言語，唯欲人之善；神佛之教，亦唯以善引人。後世之學，每每各向一偏，故爾彼此如仇敵也。有自謂道學，入神佛寺廟而不拜，自以為得真傳正道。此皆學未至，而心有偏。以正理度之，神佛者皆古之至人，我等禮之敬之，乃理之當然也。即今天下至大，神佛寺廟不可勝數，何寺廟而無僧道。若以此輩皆為異端，使盡還俗，不但一時不能，而許多人將何以聊其生耶？」<sup>26</sup>最重要的還是舉國佛道信眾極多，若強行禁絕，勢必惹起事端。

對於盛行於蒙古和西藏的喇嘛教，康熙帝繼承了祖輩的尊崇與管理並進的政策，就是一方面承認活佛在蒙藏地區的宗教地位，讓他們對當地信眾發揮影響力，成為信眾的精神支柱，同時嚴格控制活佛的出任入選，確保活佛必須效忠於朝廷，到康熙帝時，活佛的轉世靈童更要由皇帝認定和冊封。

無論康熙帝是嘉許傳教士、燒香禮佛或是冊封活佛，他的思想深層總是儒家的。康熙帝雖是滿洲族人，但是自幼讀儒書、寫漢字，尊崇孔孟。他在熊賜履、李光地的指導下，讀遍四書五經，對朱熹理學推崇備至，將之升入大成殿供奉。康熙帝崇儒，不在空談義理，而在於經世治國、學以致用。提倡儒家，可以為他爭取漢族儒士的支持，而傳統的三綱五常，也可以作為影響百姓臣民的思想器具，有利於國家的長治久安。

---

26 《庭訓格言》。轉引自孟昭信著，《康熙評傳》。南京：南京大學，1998，435頁。

當時天主教在中國的教眾人數不多，根基甚淺，其勢力不可與佛道相比。但是傳教士帶來了天文學、帶來了西洋醫學、帶來了西洋大炮、帶來了很多很多的西方科技，都是儒釋道所沒有的。試看康熙帝無論是命白晉到歐洲招募傳教士，或與嘉樂決裂時所下的聖旨，皆指明他要的是會「技藝」的人，而不是對天主教教理有深邃反省的有道之士。

康熙帝可說是因為西方科技才親近傳教士的，他自問對傳教士禮遇周到，每做一事，必定為他們設想；譬如有一宮女擅於彈琴，康熙帝很想讓徐日昇評鑑她的琴藝，但為男女之嫌免徐日昇尷尬而作罷；又一次，康熙帝器重的大喇嘛懇求康熙帝命熱拉第尼為他畫像，但康熙帝恐怕叫熱拉第尼為其他宗教的教主畫像惹他反感，於是拒絕了大喇嘛。康熙帝如此事事關照，傳教士仍然不放心；皇太子允禩命白晉在一瓶上繪畫，做為戲台道具，但白晉以為那是個「佛瓶」而拒絕了，允禩多次解釋仍不得要領，於是大聲責罵白晉：「你們竟然聲稱比我、比所有自幼讀書知禮的人更了解中國人的感情和風俗習慣……我們並不埋怨你們和你們教會的密切關係，但是我們有理由埋怨你們在你們不了解的事情上固執己見。<sup>27</sup>」同樣的事情，亦發生在禮儀問題的交涉過程。大清皇帝的一句話，臣子百姓奉若神明，豈有半分質疑；鄰近國家如有不從，往往亦揮兵相向，幾曾花盡唇舌與對方辯論？更何況，他們都是些不通國情的人！從康熙卅九年，第一次介入禮儀之爭到五十九年下令禁教，二十年間，康熙帝所花之心血實在不可謂少。在此，我們可以看到康熙帝對嚴璫、多羅或嘉樂的憤懣中，帶有一絲的無奈，更有點點的委屈。

---

27 同註 13，57 頁。

康熙帝一方面寵信傳教士，但是，又並非絕對的信任。外國人侵佔中國土地早有前科：荷蘭人佔領台灣、葡萄牙人佔領澳門、俄羅斯人入侵東北等等，康熙帝不得不防。試看尼布楚和談便知一二，康熙帝不派遣與張誠同屬法國的白晉一起出使，卻選了葡萄牙的徐日昇，只因葡法兩國正為保教權爭奪不休，兩國籍的會士也有嫌隙，如此便可叫二人互相牽制，不怕他們與俄羅斯勾結，康熙帝可謂用心良苦。禮儀之爭一事，讓康熙帝看到，透過控制喇嘛活佛而統治蒙藏各部的的方法，不能用於天主教徒，教徒的最後皈依必然是教會，即使皇帝也無法干預教徒的思想行爲，如此，教徒愈多意味著潛在的反對勢力愈大，危險愈大，這是任何統治者所不能忍受的。這一點，其子雍正帝說得很明白：「你們要讓所有中國人都皈依基督教，這是你們教會要求的，朕了解這一點，但是在這種情況下，我們的前途又如何呢？」<sup>28</sup>。

音訊阻隔與文化差異造成了中國人與天主教會之間的鴻溝，而雍正帝篤信喇嘛教憎厭天主教，即使沒有禮儀之爭，禁教之舉早晚都要發生。然而，無論康熙帝或雍正帝有多少理由，至於某事是否異端，某禮儀是否合於教理，應屬神權一邊，該由教會定斷，俗世政權不應橫加干涉。但是，為政者總有統治他人的欲望，不論是有形的行爲，或無形的思想，小至呈上乳香或檀香，大至祝聖神父主教，只要涉及本國人民，便會反責教會干涉內政。本來凱撒的歸凱撒，天主的歸天

---

28 「耶穌會傳教士馮秉正神父給耶穌會某神父的信」寫於 1724 年 10 月 16 日北京。同註 13，106 頁。

主；但是，政治與宗教從來就不能絕對的分割，歷史現實告訴我們，沒有凱撒的點頭，天主的忠僕將寸步難行；尤其是當凱撒自比為天主的時候，更容不得真天主的臨在；即使這個真天主曾被釘在十字架上，早已明言無意於俗世王權，也不能倖免。如是者，傳教士一方面要謹守天主忠僕的身份，一方面要取得凱撒的點頭認可，其中辛酸實非我輩可以體會。

康熙帝以為天主教於中國真的無用，以為准許外國人傳教是恩澤遠邦之舉，兼之害怕教會危及其統治；他卻不知強行禁絕傳教之路的同時，也斷絕了西學傳入之路，斷絕了中國進步之路。中國文明發展得很早，本來她可以坐享由傳教士帶來工業革命與文藝復興的成果，繼續走在世界各國的前列。可惜，康熙帝把中國的大門鎖上了，放棄了與世界接軌的機會；他把自己開創的康雍乾盛局限在當時當地，未能惠及後人；百多年後再開門的時候，外面的世界已不是他的子孫可應付的了。